

蒋介石、晋绥系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初步纲领的制定

杨俊

内容提要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是国民政府时期最重要的经济复兴运动,其初步纲领是蒋介石亲自访晋及间接地派出徐青甫、翁文灏、丁文江等从政学者访晋后采纳晋绥系人员经验及建议,亲拟完成。在此互动过程中,中央、地方、学界等各方面人员较好地展示了“团结”与“合作”二词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关键词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蒋介石 阎锡山 徐永昌 翁文灏

杨俊,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510275

1935年4月1日,蒋介石在贵阳与各报记者谈话,表示将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振兴农业,改良农产;保护矿业,开发矿产;扶助工商;调节劳资;开辟道路,发展交通;调整金融,流通资金,促进实业为宗旨。”^[1]这便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初步纲领。蒋介石在发表这样的纲领之时,到底受到了哪些方面的启发或者影响?学界历来缺乏对此问题的研究^[2]。本文将在参阅、考据史实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发起时纲领的制定,做一系统的探讨。

一、晋绥系对蒋介石制定长久经济政策的启发

1934年10月一个月之内,蒋介石连续三次电请晋绥系大员赵戴文,要求赵与其会晤。电文依次如下:一、10月3日“电赵戴文曰:先生何日南来,中约日内赴武汉一行。如大驾过汉,则可在中途相晤也,何如请复”^[3];二、10月22日“电赵戴文曰:贵体想已复原,至为系念。中今晨由西安返抵洛阳,日内拟即往北平小住,归途或当到太原一行,与百川(阎锡山)及诸先生把晤,以伸积悃也”^[4];三、10月26日“电赵戴文曰:中敬日抵平,刻往医院检查身体。如大驾能先来平一晤,更所企盼”^[5]。10月22日电文也预告了蒋将在不久之后亲自到太原与阎锡山等晋绥系要员会谈,似有重大事情商量。

[1]《中央日报》,1935年4月2日,第1张第2版。

[2]学界目前对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代表性研究文章如下:叶春风:《试析抗战前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开封〕《史学月刊》1987年第2期;严志才:《评国民政府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3][4][5]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8册,〔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204页,第355页,第365-366页。

10月28日,赵戴文应邀到北平,预备见蒋。赵此次觐见蒋,是全权代表阎锡山的。徐永昌记载,“早间尊光(王谦)来,谓赵次陇(赵戴文)著其来问对蒋有无话说,渠明日走平迎蒋去,阎先生意也。”^[1]赵在见蒋之前曾会见记者,谈话内容如下:“蒋莅平后,即电召本人前来,有所垂询。余特兼程来平,以备咨询,并报告一切。阎病痊愈,精神健壮,刻在河边村静养。同蒲路修过介休,预计明年全线可通车。五中全会延期通知已抵并,晋省对大会亦无提议,余俟在平谒蒋后返并。”^[2]10月29日下午,赵戴文“赴协和医院谒蒋委长,报告晋省军政近况,并请示一切”^[3]。“军”的方面,赵戴文应是报告“南调晋军,已开拔完毕”^[4]一事。次日,蒋介石在回顾10月经过时曾言:“己、晋鲁军调赣;庚、川事渐稳;辛、新疆通车;此皆统一之佳音也。”^[5]蒋对国事有如此的期望,便受到了赵戴文前日报告的影响。“政”的方面,大致如以上所述。

另外,赵戴文请示的事项,还极有可能包括对日本以及华北局势认识的问题。10月31日下午,赵戴文离开北平之前,曾拜访黄郛。黄郛记录当时情形如下:“午后,赵次陇来请示外交情形,予托其付语伯川(阎锡山)‘健’,送伊此一字恐其不稳健也。”^[6]黄郛送阎锡山此字,因恐其过分“惧日”之故,稍有安抚之意。而赵戴文代表阎锡山表现出如此担心日本会对自己不利这一举动,自有其缘由。1935年黄郛南返后,阎锡山曾于当年5月30日有言:“余曾六次寄语汪蒋,强邻伺隙,元老服藩,何时策动藩镇之不安,即可组织政府。”^[7]此元老指的就是黄郛。这句话说明阎锡山认为,只要黄郛坐镇华北,让华北各派军阀明白日本人才是自己的头号敌人,各派军阀自会自愿统一于中央政令之下,便可组织新的统一的政府。因此,阎锡山通过赵戴文表现出对日本的“惧怕”,即是向蒋示好,让蒋放心的举动。蒋、赵的这次会面,大致是一个“温情脉脉”的情形,为蒋介石不久后的访晋之举奠定了基础。

1934年11月5日,蒋介石尚在巡视华北,未到山西,便已发电,要求其“智囊”团体制定长久的经济方针。电文如下:“电翁文灏曰:请兄删日前到京,与在君(丁文江)兄会商以后经济政策,并制定方案,可请吴达铨(吴鼎昌)周作民二兄参加也。其范围以新设铁道与重工业及对外贸易重要之货物统制为重点,请先预备。”^[8]是时,蒋介石仅是要求翁文灏、丁文江、吴鼎昌、周作民等人着手经济政策的制定,并要求他们注重与统制经济相关的对外贸易及重工业、铁道建设等方针的制定,并无发起一场全面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想法,但其于晋绥系骨干赵戴文觐见后不久,且于亲自访晋前两日发此电文,自然不能排除其与赵会晤时曾咨询与经济建设有关问题的可能性。

11月7日,孔祥熙飞抵太原,预备考察水利和各地财政。当晚,“阎锡山亦亲往饭店访孔,谈甚欢”^[9]。11月8日下午,蒋介石飞抵太原,情状如下:“蒋最后下机,与阎、赵、徐、章等握手为礼。蒋笑容可掬,精神奕奕,旋即步行出机场,向沿途欢迎代表点首,表示谢意。嗣即与阎、孔共乘一车进城,赴行辕。”^[10]在与阎锡山、孔祥熙短暂地交谈过后,蒋介石“颇有所感曰,百川规模与经营,不能不为远大,奈何不

[1]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934年10月25日。

[2]《申报》,1934年10月29日,第3版。

[3]《申报》,1934年10月31日,第3版。

[4]《中央日报》1934年10月29日,第1张第2版。据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8册,[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54页可知,蒋介石曾于1934年9月19日电令阎锡山于9月一月之内调8个团的兵力到江西协助“剿匪”。

[5]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8册,[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378页。

[6]白云山馆主人:《日记》第15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1934年10月31日。

[7]阎锡山:《阎锡山日记(1931-1950)》,[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页。

[8]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8册,[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414页。

[9]《大公报》,1934年11月8日,第1张第3版。

[10]《大公报》,1934年11月9日,第1张第3版。

用之于全国与民族之上也”^[1]。11月9日,蒋介石与阎锡山共同乘车探望阎父之病,途中阎锡山向蒋介石提出了三点意见:“一、对日不立准备武力,免日仇忌,使倭对俄(我)无法可施,而后我乃有法对倭。……二、对内中央有力,地方有权,注重集中人力,消除阶级斗争,奖励科学人才与造产建设,发展物力。而其造产方法,当以物品代币钞之信用基金。三、剿匪完成时,召开救国会议,使地方军政长官免除中央救国障碍,中央为地方消除行政困难。如此则地方如不从令一致,是其自外救国之道,必为国人所共弃云。”^[2]对此三点意见,除第一点外,第二点和第三点蒋介石均“称其研究颇深”^[3],表示赞同。

当日晚八时到九时半,蒋介石“在行辕分别召见贾景德、杨爱源、周玘等三人,对晋政垂询甚详”^[4]。充分了解山西的情况之后,蒋即表现出对进一步考察山西经济情况,并为中央提供参考的兴趣。其于当晚致电徐青甫及翁文灏:“电徐青甫曰:兄如有暇,请先来太原,与百川兄一谈币制与经济政策。对于铁路与制钢经过,亦可一询其详也,来去不过十日而已。电翁文灏曰:研究经济方案时,对于币制统一办法,亦请注重。阎百川兄对于炼钢厂及修筑铁路办法,确甚经济,最好请在君先生与兄能来太原与之详谈也。”^[5]11月10日晚,蒋介石与徐永昌等谈及财政问题,徐推荐了“均一(王平)、子范(李鸿文)与谈一切”^[6]。11月11日,蒋介石与徐永昌谈及中央炼钢厂问题,“蒋谓阎先生极能经济,中央的(炼钢厂)也归阎先生办如何”^[7]。此言亦证明蒋对阎锡山办经济事业的能力,颇为肯定。同日,蒋即将离开太原时,嘱咐徐永昌“与阎先生一研究关于地方与中央权限问题”^[8]。此应为对阎锡山“对内中央有力,地方有权”经济方针建议的嘱托。

由以上材料可知,蒋介石对阎锡山之建言的认同,揭示了蒋介石制定下一步经济政策时,极有可能仿照山西经济发展的模式,发起较大规模的造产运动或经济建设运动。

11月18日,蒋介石巡视华北完毕回到江西,与中央社记者谈话,对山西省之评价如下:

山西同蒲铁路之建筑,迅捷省费,极为经济。向来兵工筑路成绩,多无可观。此次晋省以兵工筑同蒲路,收效极大,其重要原因,乃在经过严密之设计,规定一种“工作单位”,每人每日,能完成一工作单位者,付给一单位之工资,多成多给,以是类推。有此奖励办法,故士兵乐于从事,各省各种建设事业,均应仿行。晋省之兵工厂,大部分均已改为普通制造厂,出品门类甚多,大如同蒲路应用之机车车皮铁轨,及抽水机电风扇,小至火油灯磅秤图钉缝针等,无不应有尽有,俱切实用。其他如织毛制革织布陶瓷火柴等等工厂,均能成绩斐然。晋省各工厂开办费,均极节省,而管理方面,复能严密注意,此切合中国经济情形之需要者。晋省对于新生活运动之切实推行,不遗余力,尤可矜式。^[9]

同时,蒋还表示“各省对于建设事业,皆有发展与进步,此固为一极好现象。但大都缺乏整个与普遍之计划,不惟省与省间,不能连系贯通,即一省之内,亦往往发生畸形发展之病态。此种畸形或单独发展之结果,不惟财力人力,两不经济,无裨于永久基本之事业,且将发生半途而废或互相妨害之流弊,故各省应互相合作,斟酌损益,务能以最经济之人力财力,发展最适当之事业。盖各种建设工作,固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而一贯之政策,与通盘之筹划,则亦必不可少。此应由中央负责规划,乃能质调剂得宜也”^[10]。这时,蒋介石已经公开声明将要制定全国的经济工作计划了。同时,蒋介石“甚盼各省市军民长官,与各界领袖,今后务宜统一意志,协同步调,以锲而不舍之精神,首谋教育

[1][2][3][5]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8册,〔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420-421页,第423页,第423页,第424页。

[4]《大公报》,1934年11月10日,第1张第3版。

[6]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934年11月10日。

[7][8]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934年11月11日。

[9][10]《中央日报》,1934年11月21日,第1张第3版。

之改进,以立救国之根本;次及政治之刷新,与经济之建设”^[1],希望能够统一各地方意志,集中人力,以达教育、政治与经济蓬勃发展的效用。蒋回到江西不久后便发表了这样的公开谈话,可见此次华北之行,尤其是山西之行,对蒋制定经济政策的启发,不可谓不大。

二、晋绥系与蒋介石拟定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初步纲领的关系

假设蒋介石发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此一举动,从一开始就与晋绥系有较大关联,则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方针政策,或者至少是初步的纲领,极可能会参照《山西省十年建设设计画案》^[2]制定。如果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初步纲领与《山西省十年建设设计画案》有明显的关联,则亦可证明蒋介石发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受到了晋绥系建设经验的启发。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初步纲领是蒋介石亲手拟出的。1935年4月1日,蒋介石“手拟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电稿,所谓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系指全国各业总动员,提高国民之生产与消费能力,增加输出,减

表1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初步纲领及《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设计画案》相似处对照表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初步纲领	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设计画案
第一项振兴农业,改良农产	第二章经济方面,第一节增加人民生产,第一款实业行政事项,第一项即为农业。纲要共九项,其中七项涉及开发或改良农产 ^[3]
第二项保护矿产(或保护矿业,开发矿产) ^[4]	第二项为矿业,以开发新矿,择优开采,改良开矿技术与管理制度为主要内容 ^[5]
第三项扶助工商	第三项为工业,第四项为商业 ^[6]
第四项调节劳资	阎锡山1932年12月20日讲话补充“今日的造产,实在要劳资双方联合战线去发展”,主张在造产同时,增加协调劳资一项 ^[7] 。阎分析山西经济落后的原因时,第六点为“由于劳资关系之未调” ^[8] 。且阎在1934年11月9日给蒋的经济建议中曾有“消除阶级斗争”一条 ^[9]
第五项开辟道路,发展交通	第二章经济方面,第一节增加人民生产,第一款实业行政事项,第五项为交通,其内容以开辟道路为主 ^[10]
第六项调整金融,流通资金,促进实业	第二章经济方面,第三节省县村经济统制之设施,第一款经济建设之难关与打开之方策,此款均为调整金融,流通资金,从而促进实业的方针 ^[11] 。第一章政治方面,第一节改善现行政治,第一款必成事项,第五项为整顿财政 ^[12] 。樊象离草案条目中,十一整理田赋,十二整理旧税,十三推行新税,十四整顿财务行政,十五发展金融事业,皆金融之政策 ^[13]
其他:1、所谓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系指全国各业总动员,提高国民之生产与消费能力,增加输出,减少输入等而言; 2、以革除苛捐杂税(除外) ^[14] ,减免出口税则,要求新矿法之实施,禁止纸币之滥发为建设国民经济之初步;	1、(草案)其大旨以为经济建设,在开发并增进山西出产,增加输出,减少输入,俾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 ^[15] ; 2、第二章经济方面,第三节省县村经济统制之设施,今日中国之经济难关之一为对外贸易方面无法与外货竞争的问题,但其解决方案是降低生产成本,非减免出口税则 ^[16] 。盖地方政府无海关权利之故。第一款经济建设之难关与打开之方策。(方策)要旨:畅行纸币始能大事建设 ^[17] 。

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初步纲领,各条目均依据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0册;页288-290列出,不再标注。

[1]《中央日报》,1934年11月21日,第1张第3版。

[2]《山西省十年建设设计画案》是一份由阎锡山组织樊象离、邱仰濬等一批由学入政的人物在1932年末制定出台的旨在全面发展山西省地方政治及经济建设的计划。

[3][5][6][7][10][11][12][16][17]山西省政府辑:《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设计画案》,1932年,第18页,第31-32页,第32-34页,第5页,第34页,第45-48页,第12页,第45-47页,第1页。

[4]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0册,[台北]“国史馆”,2008年,仅作“保护矿产”,通行报纸,如《中央日报》,1935年4月2日,第1张第2版,则作“保护矿业,开发矿产”。

[8][13][15]阎锡山:《覆山西省政府送省政建设计划案函》《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设计画案·附录》,1932年,第2页,第2页,第1页。

[9]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8册,[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423页。

[14]即便此项不可能收到阎锡山集团的影响,但樊象离在总结山西社会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时,仍列有“七由于苛捐重税之摧残”一条,亦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初步纲领一致。参见阎锡山:《覆山西省政府送省政建设计划案函》《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设计画案·附录》,1932年,第2页。

少输入等而言,故为一整个的根本方案,而非局部的临时的办法”。该运动初步的纲领如下:“欲挽救今日民族之危急,与解除全国民众之痛苦,须有一个运动继新生活运动而起,其名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此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乃以振兴农业,改良农产;保护矿产;扶助工商;调节劳资;开辟道路,发展交通;调整金融,流通资金,促进实业为宗旨。而以革除苛捐杂税,减免出口税则,要求新矿法之实施,禁止纸币之滥发为建设国民经济之初步。今日政府增加中央中国与交通三银行之资本,以谋社会经济之安定,与农工商业之进步,亦即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一种也。”^[1]

兹主要以此核心条目,辅以整个方针(“革除苛捐杂税”除外),与《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设计画案》的有关部分作一关联度的比照,以初步验证,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发动及其初步纲领的制定,与晋绥系的建设经验和建议有着密切的关系。

依据表1,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初步纲领所列纲目,第一、二、三、五项与《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设计画案》第二章第一节第二款所列纲目相同,顺序也一致;第四项与第六项均能在《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设计画案》找到意义大致相似的内容;两者要旨方面,亦高度相似;其余枝节各项,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此外,蒋介石在1935年4月下旬,反复研究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纲领。4月20日,蒋在当日“预定”项下记有“三、国民经济建设计划”一条^[2]。4月21日,“注意”项有“五、经济建设与保息之提议”一条^[3]。4月22日,“本日纪念周后,(蒋)见二十三师官长训话,研究经济建设方案”^[4]。其在四月“反省录”中总结道:“十、国民经济方案各稿研究第一次完。”^[5]在如此反复研究的情况下,蒋于当年5月3日“电太原阎主任曰:兄去年寄下经济建设与币制政策之意见书存京,未曾带来。可否再请赐寄一份于武昌张岳军(张群)主席转寄贵阳?如可择要,先用无线电略告大意更好”^[6]。阎锡山曾于1934年给蒋介石寄了一个经济建设与币制改革意见书,此意见书只可能按照其建设山西省的经验写成,内容与《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设计画案》极有可能高度类似。

三、蒋介石智囊班子与晋绥系的进步一接触及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发动

蒋介石曾于1934年11月5日致电翁文灏,要求其于丁文江、吴鼎昌等人商量制定以后之经济计划。在大致了解山西情况之后,蒋立即致电徐青甫、翁文灏、丁文江等人往山西考察经济建设^[7]。徐青甫于1934年11月18日到太原考察,具体情况如下:

11月18日:徐青甫抵达太原,晋绥系要员即在绥靖公署设宴洗尘^[8]。

11月19日:徐永昌记载,“早做纪念周,余(徐永昌)述公务人员服用国货不力,由于高级人员提倡与督饬不力故也,换言之,余于责任上未能尽到也。午前往看徐青甫,渠对于服用国货意见与余全同,亦反对商用汽车等等。”^[9]

11月20日:“太原阎今日上午赴山西大饭店访徐青甫,谈适合中国之社会制度等问题甚详,徐永昌今晚在省府宴徐。”^[10]

11月22日:徐永昌记载,“晚饭在邱沧川(邱仰濬)家,渠与虚心(樊象离)等公请,徐青甫、朱兰荪(朱绶光)皆在座。关于废除金银代值问题,余谓徐青甫曰:昌个人素所主张者,以为不改革教育种必灭,不整理经济国必亡。在今日而言,整理经济,舍从管制外货、服用国货的途径鼓励工业、建立人

[1][2][3][4]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0册,[台北]“国史馆”,2008年,第289-290页,第530页,第539页,第548页。

[5][6]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1册,[台北]“国史馆”,2008年,第11页,第13页。

[7]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8册,[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424页。

[8]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934年11月18日。

[9]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934年11月19日。

[10]《申报》1934年11月21日,第5版。

心,则管仲、刘晏复生无所致力也。是下与阎先生以及马寅初君皆主废除金银代值,其出发点大要皆同,只是方法有出入而已。在余以为皆可,只要人民少买外货,最小限亦可使国民经济不至无代价的外流,是先生等之方法虽有不同,而杜绝入超则一,务恳各位捐除我见,苟有杜绝入超之经济办法实现,谁的方法皆可,先生忧国人也,当能以昌言为然,否则国亡后,诸先生各抱一卷未实行的救国经济论,又何益也。余言未竟,青甫首肯再再。”^[1]

11月23日:徐永昌记载,“闻之沧川、虚心云,青甫对于物产证券已不似前之隔阂,且云一切皆同意,愿先助成此法实现云云。”^[2]

11月24日:“蒋委员长派来并考察建设之徐青甫,连日除参观各新兴工厂公司,及他建设事业外,由阎锡山派邱仰濬、李庆芳、张之杰、樊象离等,屡作实际及理论之会议。徐今晨赴榆次视察同蒲路,定明午离并返杭,过京将谒蒋报告。阎今晚在绥署设宴饯行,阎与徐亦作数次晤谈。据徐谈,对晋最近所拟建设计划,确认为最合实际需要,亦颇合经济理论,对同蒲路尤称赞不置。”^[3]

以上材料归纳起来包括以下四点:1. 经此次山西之行,徐青甫对晋绥系人员提出的整理经济与管制外货、服用国货两方面的主张高度赞同。2. 徐青甫较为深入地考察了山西省的经济建设情况,亦受到了山西省当局的高度重视,对山西省的经济建设计划,亦比较欣赏。徐青甫考察完毕后,下一步工作就是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此次考察经过与所得经验。3. 其与《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画案》的设计者邱仰濬、李庆芳、张之杰、樊象离等^[4],均有深入接触,并“屡作实际及理论之会议”,所讨论者无疑是经济建设或计划等问题。4. 物产证券一事,经晋绥系人员解说,徐青甫亦表示赞同,并愿助成此项办法的实现。

阎锡山集团对蒋介石集团的这次友好的考察学习行动,立即发起了回访。1934年11月29日,“樊象离、张之杰今晚奉阎锡山命赴京沪各地,参观经济建设状况,并赴杭访徐青甫,讨论前在并研究各问题。据谈,约二十日可返并,对参观及讨论各事项,均已作充分准备”^[5]。张之杰回访徐青甫之前,曾与徐永昌道别,“午前张汉三(张之杰)来,云即往南京协徐青甫说明废除金银代值问题”^[6]。由此“协助说明”可知,徐青甫此时应已向在南京的蒋介石汇报工作,其访晋的情况蒋应已获知。

此时,晋绥系人员通过徐青甫向蒋介石表达的经济建设主张或建议共三种。一、“管制外货、服用国货”;二、欲挽救国家危亡,必须整理经济;三、“物产证券”一说,中央须推行。其中第一项“管制外货、服用国货”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初步纲领要旨“增加输出,减少输入”一点的具体表达,两者意义一致。徐青甫对此点建议高度赞同,则必然影响及蒋介石订定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初步纲领的要旨。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过程中,国货土产的调查、产销的改进及强制公务员服用国货的政策正是该运动的主要工作之一。第三项“物产证券”一说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发起之时,与该运动关系不大,亦不在其初步纲领与内涵中。

关于第二项,1934年12月13日,“新任浙主席兼民厅长黄绍竑,连日在头条巷私邸邀新任财政厅长徐青甫、建设厅长曾养甫、秘书长黄华表等,商洽浙方针。十三日先后访汪院长、蒋委员长,请示一

[1]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934年11月22日。

[2]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934年11月23日。

[3]《申报》1934年11月25日,第8版。

[4]此四人皆为《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画案》的重要组织者或参与者。邱仰濬负责政治计划的全面起草,樊象离负责经济计划的全面起草,李庆芳为计划草案第一审查委员会主任,张之杰为经济计划草案的重要参与者,亦是向阎锡山做出对计划草案解说的人。参考自阎锡山:《覆山西省政府送省政建设计画案函》《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画案·附录》,1932年,第1-3页。

[5]《申报》1934年11月30日,第8版。

[6]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934年11月29日。

切”^[1]。此日,徐青甫可能通过黄绍竑对蒋介石有进一步建议。12月29日,蒋介石到达杭州^[2]。1935年1月1日,蒋介石在杭州参加浙江省政府主席暨各委员就职典礼,徐青甫亦在场^[3]。当日,蒋介石在“注意”项下有书“六、整理方案。七、经济方案”^[4]。徐青甫在考察山西完毕之后,对蒋介石多次直接或间接的报告、建议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蒋此时已通过徐青甫对晋绥系的经济建设工作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明白了必须先全盘整理经济,而后才有进行全国经济建设之可能。至于如何整理经济,推动全国经济建设,此时蒋应正在思考中,并未有全面的方案,亦未受到更好的建议。此问题在翁文灏、丁文江二人的访晋后,才有了更为全面的解决方案。

1935年2月23日,“丁文江翁文灏今晚由平抵并,绥省两署及实业界各机关团体均派员在站欢迎,下榻山西大饭店。西北实业公司各厂长即晚在该饭店公宴。翁丁定明日参观并垣各建设事业,在并约留三二日,即赴赴汉。”^[5]2月24日,“翁丁今赴晋祠游览,明日参观并市西北各工厂,二十六赴河边访问,协商晋省建设问题”^[6]。

依据上文及蒋介石1934年11月5日、11月9日致翁文灏电判断,翁丁二人往山西考察的目的应是视察山西经济建设情况并与阎锡山进行详谈,为中央制定经济方案寻找借鉴的途径。《申报》报道的“协商晋省建设问题”,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议题。据徐永昌记载,徐于2月23日晚“七时一刻至大饭店晤翁文灏、丁文江”^[7]。2月24日早“九时许,翁、丁来,稍谈……六时在中和斋请翁、丁及军分会高级参谋毛、张两君”^[8]。由此可知,1935年2月24日,翁丁与徐永昌应有较为深入的接触。

胡适在回忆丁文江的生平事迹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记载,“(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在君、咏霓(翁文灏)和我三人会商,我们拟了一个电报,由咏霓用密码打给蒋委员长”^[9],蒋介石亦于次日回电翁文灏^[10]。从蒋介石回电的速度以及翁文灏直接加密发电的方式可知,最晚从1933年3月3日起,翁文灏便已有通过专门的密电向蒋介石直接报告的权力。翁丁二人很有可能会通过密电向蒋呈报访问山西的感想及与徐永昌等人会商经济方案的情况。如果这种假设正确,那么与此同时,蒋介石一定会有所反应。

翁丁二人考察山西的同时,蒋介石连续两日在“预定”“注意”项下记有发展地方经济相关之语。1935年2月25日,蒋书“注意一、财政紧缩,经济方针当使各省尽量发展,使其能自给自足,与邻省相互协济,不假外求,以增加出超。如此,则中央关税虽减少,而国基则固矣”^[11]。2月26日,蒋书“预定:三、缩小省区方案。四、地方经济发展方案。注意:一、缩小省区。二、发展地方经济,乃为次殖民地应急之政策,亦于整军有益也”^[12]。蒋还在2月反省录中写到:“发展地方经济,先使各省能自给自足,与互助通惠,不计关税之减少,而中央以统制金融与统一币制为财政之命脉,此策或亦不误也。”^[13]由此可见,蒋介石认为在当时政局情况下,整理经济的方法无非两途,发展地方经济与中央统制金融。这样便可增加出超,以图达到自给自足,解决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

早在1934年11月11日蒋即将离开太原时,曾嘱咐徐永昌“与阎先生一研究关于地方与中央权限问题”^[14],蒋介石此时定下前段所述经济方针,极有可能是翁丁二人接受徐永昌对中央、地方在经济上

[1]《申报》1934年12月14日,第3版。

[2][3][4]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8册,〔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672页,第4页,第14页。

[5]《申报》1935年2月24日,第8版。

[6]《申报》1935年2月26日,第8版。

[7]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935年2月23日。

[8]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935年2月24日。

[9][10]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第153页。

[11][12]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9册,〔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521-522页,第532页。

[13]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0册,〔台北〕“国史馆”,2008年,第59页。

[14]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934年11月11日。

权责意见后对蒋密电建议的结果。发展地方经济及中央统制金融与统一货币之原则应是为解决《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设计画案》中“此外就山西位置而论,不过一省,今以一隅之地,为大规模之建设,于环境应付上有无困难,法制根据上有无窒碍,均应顾虑及之”^[1];解决与物美价廉的外货竞争问题“须对于省县村设立经济统制机关”^[2];解决财政无法支持经济建设时“只有增添纸货币之一法,但增添新货币,须具必要之两条件:(一)纸币兑现;(二)畅行汇兑”^[3]等此类的问题而定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对阎锡山“对内中央有力,地方有权,注重集中人力,消除阶级斗争,奖励科学人才与造产建设,发展物力”^[4],及晋绥系人员“按经济发达之原则,组织愈集中,发达愈容易。然在生产落后,经济被侵略之国家,不止不能达到发展经济之目的,反足以招侵略者之摧残,致无立足余地”^[5]等建议和见解的一种接受和采纳。

除此之外,阎对蒋的建议还有“奖励科学人才与造产建设,发展物力”,蒋也于1935年2月27日“预定”项中记有“设立发明厅或处”^[6]一条,亦可能通过翁文灏、丁文江二人间接受到晋绥系人员意见的影响。

发展地方经济的政策属于阎锡山“造产运动”的重要内涵之一,且蒋曾于给叶楚伦的电文中说到:“国家社会,皆濒破产,致此之由,其结症乃在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能统一。其中关键,全在中交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之反时代之传统政策……今日国家险象,无论为政府与社会,只有使三行绝对听命与中央,澈底合作,乃为国家民族唯一之生路。”^[7]这就是说金融与币制的统一,最重要的初步工作即是增加三行的中央资本,而增加三行的中央资本,“亦即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一种”。

后来,蒋介石解释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涵义时言:“盖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者,为促起人民以自动改善国民之经济,即为集合全国社会与生产机关各部分之努力,以建设健全之国民经济。”^[8]其意即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发动国民主动造产的运动。在实施的过程中,“研究发展全国农工副业及地方特殊产品”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主要任务之一^[9]。同时,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的分会和支会,其会长皆能总理该分会或支会一切事务,各分支会财政、人事及决策皆相对独立^[10]。以上两点都是“地方造产”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要旨的反映。

可以这么说,地方造产和中央统制两者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发动之时,其实是该运动一阴一阳,一内在一外在的重要内容,两种内涵一直贯穿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发展的始终。

以上材料说明,至1935年2月底,蒋介石通过翁文灏、丁文江的访晋,已经认识到地方造产与中央统制为整理经济,解决国民经济发展问题的不二法门,且蒋介石之前通过亲自访晋及介绍徐青甫访晋亦得到了不少经济建设的经验。三次直接或间接访晋已经让蒋介石充分了解了山西省的经济建设经验及晋绥系人员的有关建议,并且肯定此种经验和建议可以用在全国经济建设之上。

另外,1935年4月5日,蒋致电钱昌照转翁文灏,电文如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宗旨,想已在报上阅及。兄与在君先生等对此请详述意见,如能拟一整个实施方案,用飞机带来,或兄能亲来面谈更好”^[11]。此电文发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电稿之后,充分证明了翁、丁二人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初步纲

[1]阎锡山:《覆山西省政府送省政建设计划案函》《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设计画案·附录》,1932年,第3页。

[2][3][5]山西省政府辑:《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设计画案》,1932年,第47页,第47页,第48页。

[4]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8册,〔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423页。

[6]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9册,〔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540页。

[7]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0册,〔台北〕“国史馆”,2008年,第170页。

[8]蒋中正:《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中央周报》第384期。

[9]《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章》,《经济杂志》第1卷第3期。

[10]《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分会组织章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支会组织章程》,《中央周报》第421期。

[11]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0册,〔台北〕“国史馆”,2008年,第345页。

领的制定只有间接的,而没有直接的关系。

从本节分析可知,徐青甫、翁文灏、丁文江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刚发起之时,应是主要作为蒋阎两集团沟通的中介,并依藉本身的学业素养审查晋绥系的建设经验及建议是否可行,其本人作为学者单独对经济建设建议的作用暂时还不明显。但依据“闻蒋氏提倡此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因鉴于目前经济危机,国内各方面所拟议挽救办法,均非治本之策,乃征询金融经济专家,草拟计划,其内容包括甚广,现正由蒋整理中,不日即可发表”^[1]此言可预计,包括徐青甫、翁文灏、丁文江和吴鼎昌在内的学者兼智囊团体,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日后的计划和实施过程中,应将会起主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初步纲领,应是蒋介石通过直接及间接访问山西,了解并肯定山西省经济建设经验与晋绥系人员有关经济的建议之后,以阎锡山集团意见书的大纲为底本亲拟完成的。在北方内忧大体解决,外患日渐严重,“剿匪”工作顺利推进与西南贵州、四川、云南各省局势的稳定,并有一批重要的学者从政的大背景下,蒋介石受到了部分地方实力派、从政学者的影响并得到了较多的建议,对经济建设产生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发起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制定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初步纲领。

“虽曰此项建设运动的整个办法尚在整理中,然寥寥数语,已将纲领揭橥无遗,救时良策,莫此为善,兹为唤起国人的注意。”^[2]蒋介石亲手草拟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初步纲领,虽并不是随便拟就,但也就是一个的最初宣言,旨在“唤起国人的注意”。在其智囊团体制定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整个方针政策之前,蒋介石先就自己的认识与手头掌握的有限材料,拟定了初步的纲领并公告全国,宣告即将进行全国规模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运动发起之时,便已初步呈现出以下的景况:有经验的地方实力派提供建设经验,充分体现了“团结”二字;有学养的专家赴实地考察,并依据平日所学审查地方的建设经验是否可行,充分体现了“合作”二字。中央、地方当权派的团结,并能有效地运用专家的知识资源进行政学合作,这当是这场经济建设运动的基石。

[责任编辑:肖波]

Chiang Kai-shek, Jinsui Military's Contribution to Formulating the Civil-Economic Construction Movement

Yang Jun

Abstract: The Civil-Economic Construction Movemen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revival move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ivil Government. The preliminary platforms was formulated by Chiang Kai-shek himself referencing Jinsui Military's experience and advice about economic constructing, after visiting Shanxi by himself and through Xu Qingfu, Wen Wenhao and Ding Wenjiang. During the entire proces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local forces and the academics had shown us the importance of unity and cooperation for economic constructing. When we are constructing our economic nowadays, this situation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Keywords: the Civil-Economic Construction Movement; Chiang Kai-shek; Yan Xishan; Xu Yongchang; Wen Wenhao

[1]《国内外大事纪略——自廿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九日》,《北方公论》第93期。

[2]凌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重要》,《北方公论》第93期。